

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

分科本○历史

纪念版

印度与世界文明

下卷

[印] D.P. 辛加尔 著



SINCE 1897

商务印书馆
The Commercial Press

印度与世界文明

下卷

[印] D.P. 辛加尔 著

庄万友 等译

商務印書館

2017年·北京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印度与世界文明·下卷/(印)D. P. 辛加尔著;庄万友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7

(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120周年纪念版·分科本·历史、地理类)

ISBN 978-7-100-13317-3

I. ①印… II. ①D… ②庄… III. ①文化史—印度②世界史—文化史 IV. ①K351.03 ②K10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7)第 073720 号

权利保留，侵权必究。

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
(120周年纪念版·分科本)

印度与世界文明

下卷

[印]D. P. 辛加尔 著

庄万友 等译

商 务 印 书 馆 出 版

(北京王府井大街 36 号 邮政编码 100710)

商 务 印 书 馆 发 行

北京中科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ISBN 978-7-100-13317-3

2017 年 8 月第 1 版

开本 880×1240 1/32

2017 年 8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印张 16 1/8

定价：59.00 元

D. P. Singhal

INDIA AND WORLD CIVILIZATION

1972 published by D. Mehra RUPA & CO.

根据 D. 梅赫拉 · 鲁巴有限公司 1972 年版译出



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 (120年纪念版·分科本)

出版说明

2017年2月11日，商务印书馆迎来120岁的生日。120年前，商务印书馆前贤怀揣文化救国的理想，抱持“昌明教育，开启民智”的使命，立足本土，放眼寰宇，以出版为津梁，沟通中西，为中国、为世界提供最富智慧的思想文化成果。无论世事白云苍狗，潮流左右激荡，甚至战火硝烟弥漫，始终践行学术报国之志，无改初心。

遂译世界各国学术名著，即其一端。早在20世纪初年便出版《原富》《天演论》等影响至今的代表性著作，1950年代后更致力于外国哲学和社会科学经典的译介，及至1980年代，辑为“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汇涓为流，蔚为大观。丛书自1981年开始出版，历时三十余年，迄今已推出七百种，是我国现代出版史上规模最大、最为重要的学术翻译工程。

丛书所选之书，立场观点不囿于一派，学科领域不限于一门，皆为文明开启以来，各时代、各国家、各民族的思想与文化精粹，代表着人类已经到达过的精神境界。丛书系统译介世界学术经典，

引领时代思想,为本土原创学术的发展提供丰富的文化滋养,为推动中国现代学术和现代化进程做出了突出的贡献。

为纪念商务印书馆成立 120 周年,我们整体推出“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120 纪念版的分科本,延续传统分为橙色、绿色、蓝色、黄色和赭石色五类,对应收录哲学、政治·法律·社会学、经济、历史·地理和语言学等学科的学术经典著作,既利于文化积累,又便于研读查考,同时向长期支持丛书出版的译者、编者和读者致以敬意。

两甲子后的今天,商务印书馆又站在了一个新的历史时间节点上。我们不仅要铭记先辈的身影和足迹,更须让我们的步伐充满新的时代精神。这是商务人代代相传的事业,更是与国家和民族的命运始终紧密相连的事业。我们责无旁贷,必须做好我们这代人的传承与创造,让我们的努力和成果不仅凝聚成民族文化的记忆,还能成为后来人可以接续的事业。唯此,才能不负前贤,无愧来者。

商务印书馆编辑部

2017 年 5 月

目 录

第一章	佛教的东部发展水平	1
第二章	红色印第安人或者亚美人 ——太平洋波浪中的印度浪花	45
第三章	苏伐刺蒲迷：印度文化的亚洲化	105
第四章	伊斯兰教对印度社会的影响	215
第五章	欧洲发现印度	270
第六章	西方对近代印度的反应	323
第七章	印度对现代欧洲的反应	383
	1	
注 释	441	
参考文献	458	
索 引	514	

第一章 佛教的东部发展水平

佛教在中亚和中国一旦站稳脚跟，就必然会传播到诸如朝鲜、日本和蒙古等毗邻地区。这些国家同印度有某些直接联系，虽然佛教在蒙古的部分影响是同西藏接触的结果。尽管佛教渗入朝鲜的准确开端还不清楚，朝鲜像中国一样感受到两股巨大浪潮的影响是无疑的：一股来自北方，起源于中亚并经由魏帝国^①传播到朝鲜和日本；另一股来自南方，起源于印度和东南亚，通过中国南方传向中国北方、朝鲜，可能也传到日本。

佛教传到朝鲜是在4世纪后半期。朝鲜此时分离为三个王国——北方的高句丽（Koguryo）、西南方的百济（Pekche）和东南方的新罗（Silla）。这些国家不断进行战争，它们的疆界变动不定。虽然所有这些国家欢迎佛教，并且朝鲜佛教的命运像朝鲜政治命运一样同中国的发展联系在一起，这三个地区佛教的历史还是并非完全一样。

佛教是受王室隆重邀请，由中国僧人顺道（即 Sundo）在372年传入高句丽的。他来自邻近于朝鲜北部边境的一个小王国——中国此时分裂为十六国。另一位中国僧人阿道（A Tao）



^① 魏帝国指中国的北魏王朝。——译者

随他之后而来。国王在 375 年修建两座寺院，给他们每人一座。通过一位名叫摩罗难陀的印度或者西藏僧人，佛教在 384² 年从南方传入百济。据说，百济国王到京郊来迎接他。其他中国僧人很快随摩罗难陀之后到来。寺院开始出现，佛教成为国教。由于其孤立的地位，新罗是最后接受佛教的王国，在佛教被传入高句丽之后三十多年。根据传说，靠向佛做祈祷治愈了国王女儿疾病的佛教僧人墨胡子，说服了新罗国王从中国请一些僧人。

甚至很有可能，佛教在被传入高句丽之前便由海路传到了百济，因为百济与中国南方有海上联系。这一事实难以证实，因为属于这一时期的佛教艺术在百济遗存下来的寥寥无几，高句丽的情况也是如此。两个王国的艺术品都毁于它们同新罗的王朝战争时期。确切资料的缺乏尤其令人遗憾，因为与日本建立联系并且在 6 世纪中期为佛教教义和艺术传入日本起到发射台作用的正是百济。

668 年，朝鲜统一在新罗王朝的统治之下。新罗王朝统治到 935 年为止。许多朝鲜僧人去中国学习佛教教义，有些甚至去了印度。根据义净的记载，五名朝鲜僧人在 7 世纪期间访问印度。朝鲜僧人慧超^①由海路行至中国福建，然后在大信寺学习梵语和佛教达十年之久，在一名中国僧人伴随下继续前往印度。在中国学习的人当中，法相宗的圆测（613—683 年）、华严宗的元

^① 慧超，一作惠超，幼年来中国，后航海至天竺，遍诸佛迹，于公元 727 年取道陆路还至中国。撰有《往五天竺国传》三卷。——译者

晓（617—670年）与义湘（625—702年）最为著名。元晓是该时期著名的僧人，他奠定了朝鲜佛教的坚实基础，他的著作即使在中国和日本也十分受尊重。不过，他并没有去当时在唐王朝统治下的中国，尽管对学者们而言，去中国学习是风行一时的事。承认一切众生没有区别地具有佛性的华严宗的教义，最早在7世纪后半期传入朝鲜。叟信是积极与唐代中国学术界联系的朝鲜僧人，由于他的努力，瑜伽行派佛教的“唯识”教义在朝鲜传播。朝鲜大量借用中国文明，这种倾向当时有助于佛教的发展，虽然佛教的可怕对手儒学也在8世纪传入。

新罗的首都庆州（Kyongu）是繁荣的佛教文化中心和贸易中心，吸引着印度、西藏和伊朗的商人。随着佛教的发展，庙宇、寺院和印度塔出现了。今天，在庆州附近保存下来的若干遗迹和某些早期新罗艺术，在风格方面明显是印度风格。³

在935年取代新罗王朝的下一个王朝高丽（Koryo）虔信佛教。¹因此，佛教艺术和文化得到广泛的表现，11世纪成为佛教在朝鲜最繁荣的时期。可是，这也是一个边境之外的民族不断进逼和入侵的时代。尽管成功抵抗了这些入侵者，一种不安全感还是继续在朝鲜存在，这使得在宗教解脱和慰藉中寻求安慰的需要增加。在这个世纪末，太子成为僧人，去中国学习，他回国便宣传天台宗佛教的教义。在他的创始下，大量佛经被从邻近地区引入，并且在朝鲜刊印。在高丽时期，佛教成为朝鲜宗教生活的全部基础，影响人民的思想意识、风俗习惯和道德，还有国家的政治和经济生活。宗教节日由宫廷隆重壮观地加以庆祝，华丽的庙宇被修建。许多佛教僧人甚至在行政部门

占据显赫职位。可是，在高丽占支配地位的后半期，佛僧参政开始引起日益增多的反对。

迄那时为止一直是与新罗王朝相联系的作为朝鲜贵族的宗教的佛教，通过如义天这样的一些著名僧人的努力而成为老百姓的信仰：义天将禅宗（禅定或者禅）介绍到朝鲜，他因编辑汉文三藏的目录而出名。汉文三藏在朝鲜语中叫《大藏》（*Taejang*），刊印于1010年。禅宗在朝鲜广泛传播，在12世纪像智纳（Chinsul）所教导的那样变得格外流行。禅宗终于在朝鲜获得优势，虽然喇嘛教在蒙古统治中国期间被传入朝鲜。

高丽王朝1392年衰落之后，佛教一般受到国家压制，只有偶尔的缓解时期。体现中国新儒家的朝鲜李氏（Yi Chosun）王朝（1392—1910年）统治者鼓励儒家学说的复兴。儒家被王室给予如此热情的赞助，以致儒生对其他信仰变得极端不容忍。那些因为佛教强调人类平等而遭受权利和声望损失的封建贵族，站在儒家一边。尽管有国家的压制政策，佛教作为群众的宗教继续繁荣；国家的压制政策，在太宗国王（1401—1418年）的统治下变得严厉。⁴僧人处能（Hanho）刊印了谴责这次严厉迫害的著名书籍。下一个国王世宗（Sejong）设法结束了迫害，世宗实际上称自己为佛的捍卫者。他是一个明智、机警的统治者，认识到他所帮助翻译的佛教经典的巨大学术价值。他还被认为是朝鲜字母系统“谚文”（*Hangul*）的发明者。

15世纪，当朝鲜成为中国的藩属国时，朝鲜佛教的命运更加受佛教在中国的起伏影响。随着日本作为大国的兴起，朝鲜越来越受到日本的控制，并于1910年被日本兼并。日本佛教徒

利用变化了的政治环境，加强了他们鼓励朝鲜佛教的活动，并且根据自己的模式重建它。尽管朝鲜佛教保持了自己的特色，它肯定还是由于日本佛教僧人的活动而受益。根据 1926 年的数据，朝鲜有 1363 座寺院和 7188 名佛教僧侣。

佛教在朝鲜仍然深受尊重，尽管有儒家道德观对朝鲜思想和生活的影响，朝鲜仍然是佛教徒们积极参与公共福利活动，特别是教育活动的国家之一。现代朝鲜的佛教，是带有信仰阿弥陀佛和弥勒菩萨色彩的禅宗。虽然朝鲜没有为佛教贡献它自己的流派，在教义方面没有得到显著的发展，还是在中国和日本之间起着文化中介作用，从而将佛教传播到日本。

在佛教来到朝鲜之前，现存的本地信仰以萨满教的形式扎根，萨满教是太阳、大地和自然力崇拜还有祖先崇拜的混合体。在三国时代，朝鲜人相信人类的最终目标是了解、服从和崇拜天帝，天帝是人类一切事务的审判官。儒家将自己的道德准则带到这里，佛教将自己的神祇带到这里。不仅作为得到高度发达的哲学，也作为成熟的宗教，佛教很快渗透到社会的各个阶层，并且开始影响和丰富朝鲜文化、艺术、音乐和科学知识的所有分支。它赋予朝鲜人以他们最缺乏的东西：安全感和希望。在最初进入这个半岛的时候，按照与在中国和日本所采取的相同方法，佛教将本地神祇纳入到佛教的万神殿当中，它们被当作佛以前的化身而受到欢呼，并有了新名字。例如，长白山的精灵白袍贞女被称为文殊师利菩萨，她住在长年不融化的积雪中。⁵

朝鲜佛教常常是国家事务中的有力因素，它有时实际上控制着国家。这一现象的主要原因，除了它在老百姓中流行和其

组织中的某种军事性之外，还有它对于知识分子和文人的吸引力。佛教徒经常积极参加反抗侵略的爱国战争。这方面的重要例子，是由僧人西山（Sosan）组织的抗击日本军阀丰臣秀吉发动的入侵运动。佛教徒在战争及和平中以动员自己僧侣团体的劳动力从事公共福利的善行来与国家合作。例如，南汉山要塞是在僧人妙湛（Pyogam）的指导下，由佛教僧众修建的。佛教越来越多地与世俗事物联系，寺院和宝塔的建造以及经典的刊印，被认为是国家抵御敌对势力的象征；佛教建筑也是为防御和安全修建的，虽然它们的首要目的总是促进宗教。

在朝鲜统一在一个王朝统治下的新罗帝国时期，朝鲜文化在各方面取得巨大进步。这一时期在庆州东南修建的石窟庵^①华丽的石窟是其中之一。这些石窟将从印度经中亚向朝鲜延伸和从中国向日本延伸的石窟寺长链连接起来。石窟庵是根据卓越的对称设计建造的，并且以耀眼的浮雕和塑像装饰。它可能建造于8世纪中期，虽然有学者给它确定的年代更早。可是，朝鲜寺院建筑的基础是在三国时期奠定的。

朝鲜佛教寺院和庙宇的地点与总的环境，同中国和日本的地点和环境极其相似。它们一般位于山冈或者高山之中，有令人产生敬畏与虔诚的、高大森严的树木环绕。寺院前面一定距离的地方，建有令人印象深刻的门径。寺院的名称有时用梵文字母刻写在正门的中楣上。金刚山34所佛教修养处当中最令人

^① “石窟庵”的英文 Sokkulam 是对韩文的音译，不太标准，更多见的是 Seokguram。此地位于一俯瞰日本海的山坡，被韩国政府编定为第24号国宝，1995年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为世界文化遗产。——译者

印象深刻的是榆旃寺（Yu-Chom-sa），它以安放在翻转过来的树⁶木根部的 53 尊坐着和站着的小型佛像为特色。根据古代佛教的传说，这个结构是纪念 53 位印度僧人创建这座寺庙；他们在许多世纪以前来到朝鲜，靠将佛像放在每棵树的根上而战胜了一群敌对的龙。

朝鲜人发展的另一种艺术是铜钟的铸造，铜钟是每一座佛教寺院令人印象深刻的、具有艺术性的特征，在佛教仪式中具有重要作用。它们在朝鲜的形式尤其精美，并且以有人物和装饰品的浮雕作装饰。新罗的佛教艺术由许多移居国外的人带到中国和日本。例如，中国山东省的寺院，便是按照朝鲜模式建造的。

在中国或者在中国文化渗透所及的那些毗邻国家，文化是少数贵族、官僚的特权，他们小心翼翼地不让老百姓接近它。但是，佛教突破了这些障碍。儒家经典构成了朝鲜宫廷和贵族教育的基础，佛教则吸引着知识分子和普通大众，并且构成大众教育的基础。的确，佛教靠有意识地从下层群众中吸收皈依者而在文化传播中做出了重要贡献。佛教徒走到哪里，宗教文学就在哪里以当地的语言刊印，甚至塑像、图画和卷轴都具有了本地的解释。⁷

中国将自己的语言和表意符号给予朝鲜。印度贡献了梵语和构成音节表即字母表的语音字母，不仅有利于本地语言的书写和刊印，而且也是儒家学说推广的辅助品。朝鲜语里称为“吏读”（*nido*）的音节表像日语的“假名”（*kana*）一样，是一些音节的汇集，而不是真正的字母。吏读赋予某些较常用的汉字以音值，虽然其中有些准确代表朝鲜语语音的梵语字母

可能令人联想到有一种本地的书写方法。朝鲜字母即共同语 (*unmun*) 是由名叫世宗 (即 Syel-chong, 或者 Sye-chong)^① 的佛僧发明的，他是朝鲜历史上最有才干的学者之一。²

李氏王朝第四代国王世宗鼓励佛教经典的翻译，并被认为亲自做了一些翻译工作。不过，翻译方面真正的努力，是由虔诚的佛教徒和该王朝的伟大统治者、第七任统治者世祖做出的。他设立佛教事务部门，并且将许多佛教经典翻译过来。

佛教从朝鲜传播到日本。日本虽然是小国，在历史上却起着极为重要的作用。⁷ 尽管受到自然地理环境的限制，充满朝气和活力的日本人民仍然不仅在亚洲几乎全部屈服于西方霸权的时候保持自己的独立，而且在实现其工业和技术现代化又不失去自己传统文化特色的方面取得显著进步。这种传统与现代性独特融合的主要原因，是它愿意接受和适应外来贡献。⁸ 日本证明愿意借用和吸收外国文化特征，不是文化低下的表现，而是文化有活力的证据。日本文化是神道教 (Shinto)、儒家学说和佛教的混合体。奠定日本文明基础的圣德太子，将这三个体系比作日本文化之树的三个组成部分：神道教是栽种在民族传统和民族气质土壤里的根本，儒家学说是法律、教育制度和道德准则的主干和分支，佛教则是盛开的宗教感情的鲜花和精神生活的果实。日本人民可以信奉佛教、神道教或者儒家学说，或

① 根据原文内容，这里的朝鲜字母发明者与原文第四页谈到的“谚文”(the *Hangul*) 创立者，应该都是“世宗”，即朝鲜王朝第四代国王世宗李祹 (1397—1450 年)；他既信奉儒学，又信仰佛教；但是，在“谚文”创立过程中，他实际上只起了召集人的作用。——译者

者这些教义的任何结合形式。在 7 世纪初期，的确存在过提倡这样一种结合的叫作心学（Shingaku）的运动。日本人尽管为自己的传统文化感到自豪，还是经常有意识地努力从其他国家获得知识。日本领导人早在 7 世纪就认真挑选有才干、有前途的青年学者，将他们派遣到在国外的使馆特别是在中国的使馆，责令他们带回外国知识。在历史上，可以引证的与日本这种引进知识的做法相同的寥寥无几。尽管日本天皇有时在地位问题上与中国皇帝不一致，日本想获得中国一切有用知识的愿望还是没有减弱。³ 因为日本人渴求外国知识并且格外细心地保护它并对它加以丰富，所以日本经常被恰当地描述为东亚文化的宝库。这个特点的确使史学家们可能对亚洲文化自身的演进过程进行有价值的透视。不借助于日本的资料，亚洲音乐史、戏剧史和宗教仪式舞蹈的历史就会是不完整的。有些在其他国家已经绝迹的文化形式在日本仍然保存：例如印度 7 世纪的音乐剧。

日本本地的宗教神道教反映本地人民生活的性格，与民族传统和社会风俗习惯密切相连。⁴ 起初，它是不能言喻的宗教，不提倡固定的教义；它是一种对于一些神祇和对于自然精灵与死者神灵的杂乱崇拜，虽然有些权威人士否认神道教最初包括对祖先的崇拜。尽管可能存在祖先崇拜的精神和保护家族与家庭的愿望，还是没有像现在这样作为该民族道德生活的不可分割的重要组成部分的清晰的忠诚或者孝敬的概念。早些时候的宗教与管理没有区别，这种实践使皇族能够成为国家的家长，使天皇能够获得神性。⁸

中国思想和宗教习俗在佛教之前的日本起了某些作用，但

是这些思想和习俗退化成了预测的方法。只是在日本接触了被佛教思想所修正的具有玄学背景的儒家道德之后，中国思想才对日本精神产生了影响。儒家学说在皇宫受到欢迎，后来对日本法律和教育制度产生了真正的影响，并且贡献了教学准则的系统方法。道家思想也对日本有一些影响，但是它从来都不太重要。日本思想文明的真正进展是在佛教到来之后才取得的。

佛教在艺术和科学、文学和哲学方面丰富的文化遗产与佛教一起进来，它们唤起更加高尚的思想，激励本地的艺术和文学。佛教为形而上学的思辨提供了丰富的材料，满足了日本人对无法看见之境界的向往之情。它的确给他们迄那时为止所未知的深奥的神秘主义以清楚深刻的理解，它导致详尽的精神训练方法的发展和教士制度的建立，导致对宇宙论和末世学体系的讲授。介绍到日本的佛教大乘形式，在其从印度越过中亚、中国和朝鲜的旅途中具有各种各样的思想和习俗，但是日本能使之具有独特的日本特色。

尽管对佛教最初从朝鲜来到日本这一点通常一致，对于它到来的确切日期的记载还是不同。在一些年代属于大约 300 年的铜镜上发现有佛教的人物，但是他们的真正意义是否为当时的日本人所知还不肯定。已知最早的著名佛教徒是司马达，他于 522 年作为逃难者去日本。后来，他的家族产生了包括第一个日本尼姑和 7 世纪最伟大的艺术家止利在内的更有名的佛教徒，止利在奈良铸造了法隆寺大像。

9 日本佛教史大致分为三个主要时期：从 6 世纪一直到 8 世纪的传入时期（叫作足助和奈良时期）；从 9 世纪一直到 14 世